

广西社会科学 专家文集

GUANGXI SHEHUI KEXUE ZHUANJIA WENJI

徐杰舜集

——
汉民族研究集萃

◎ 徐杰舜著

线装书局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

徐杰舜集

汉民族研究集萃

徐杰舜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杰舜集/徐杰舜著. —北京:线装书局, 2012. 2

ISBN 978-7-5120-0458-0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民族学—文集 IV. ①C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4260 号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徐杰舜集

作 者: 徐杰舜

责任编辑: 赵 鹰 区向明

装帧设计: 张谱丽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庞汉生

副 主 任 汤竹庭 许家康

委 员 张瑞枝 姚 兵 曹 平 张 流 刘 俊

何 明 黄学超 巫文强 覃柳琴

主 编 庞汉生

执行主编 许家康

副 主 编 张 流 王庐云 马 文 梁培林

特邀编审 廖子良 区向明 徐远征

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并从广西的实际出发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推出一大批理论成果,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推动广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深刻认识自身担负的光荣使命,自1984年成立以来,在党委和政府联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方面努力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在开展学术研究和参与重大决策方面努力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方面努力发挥好咨询服务作用,在帮助干部群众增强理论素养和提高理论水平方面努力发挥好宣传普及作用,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把服务社会科学界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把社科联作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家来建设,开展一系列服务社会科学界的活动。总结和整理广西社会科学界优秀专家历年来的理论成果,编辑出版《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就是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领导班子根据社科联的职能作出的服务社会科学界的又一项重要举措。本文集计划收入

约 100 位广西社会科学界优秀专家的理论成果,从 2009 年起陆续编辑出版。

总结和整理社会科学优秀专家历年来的理论成果,对于充分发挥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科学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收录在广西工作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广西优秀专家和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等社会科学优秀专家历年来的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重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果;成果形式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也收入已出版专著的某些章节和调研报告的部分内容,一般每人 1 集,每集版面规模 25 万~30 万字。

收入文集的文章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精选精编;既忠实于原稿,又坚持与时俱进,力求全面体现专家的学术成就和水平,积累广西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文集在专家自选自编的基础上,由文集编委会及编辑工作班子统一组织编辑加工和审稿,送出版社审定出版。

为做好《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门设立文集编委会及编辑工作班子,并得到相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相关专家学者多年来不懈的努力和艰苦探索所创造的丰厚理论成果,为文集的编辑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我们秉持精益求精、宁缺毋滥的原则,认真选编,严把编校质量关,力求使每一本文集都成为精品,但百密总有一疏,在浩大的编辑工作中,难免疏漏和差错,还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目 录

前言	(1)
----------	-------

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思路

我的汉民族研究之路	(3)
汉民族研究刍议	(17)
汉民族研究再议	(18)
试论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	(21)
汉民族研究与中国文化	(31)
客家人、汉民族与中华民族	(42)
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	(52)
从多元走向一体是民族过程的规律 ——以汉民族的民族过程为例	(64)

汉民族研究的理论观照

人们共同体刍议	(83)
中国古代南北民族关系史比较研究断想	(89)
社会主义社会既是民族繁荣时期,又是民族融合时期	(99)
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	(106)
论族群与民族	(114)
再论族群与民族	(123)
族群结构简论	(135)

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案例

汉族民间信仰特质的人类学分析	(145)
从民间传说看汉族传统节日的起源	(172)
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和民俗文化	(180)
平话人研究的现状及走向	(192)
平话人与客家人比较研究 ——以广西为例	(199)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船家与高山汉比较研究	(210)
中国葫芦文化的人类学解读	(223)
春节风俗与蜡祭	(232)
灵岩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	(238)
屯堡人研究创新漫论	(245)
关于澳门土生葡人问题的思考	(252)
作者社科成果要目	(265)

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思路

我的汉民族研究之路

历史的车轮这么快就把我推过了甲子年，一晃又是奔七之年了。

少年求学之时，正是 20 世纪 50 年代，我住在武汉市华中里 25 号。那是一个仿照上海石库门的里弄，号称武汉最大的里弄，我就读的华中里小学就在其中。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如饥似渴地读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列宁青少年时代的故事》《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以及中国人都喜欢读的《西游记》《水浒传》等书。在读书中，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把书中好的句子抄在笔记本上，1955 年进初中后则把好的句子写进了日记里。然后我就找机会依样画葫芦，把抄下来的好句子用到作文中去。记得在小学五年级时，教语文的张老师布置了一道作文题：《春游》。张老师是一个年近 50 岁的男老师，他身体不好，但教书特别认真，给我们小学生的印象是“严”。这次作文我写了全班同学到中山公园春游的经过和感受。那时我们从市区到中山公园去一趟十分不易，好像远行一样（其实也就十几里路）。作为小学生的我们早早起了床，吃过早点，带上母亲准备好的面包、蛋糕等干粮，似乎是长途行军地到了当时在铁路外的中山公园。在里弄长大的孩子，平时连树也难得见到一棵，进了公园，在大树、绿草、湖水之中真是玩疯了。所以我在作文《春游》中用一词，写如何玩得津津有味，又如何吃得津津有味。张老师在“津津有味”旁用红毛笔划了一串串的圆圈，还让我在班上朗读了我的作文。那时，我深受鼓舞，知道了依样画葫芦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1961 年秋，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当时中央民族学院仅一个分院，为

题注：本文专为本文集而写。

了解决南方的少数民族不适应北京的气候,而在武汉设立了分院。后改为中南民族学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成了中国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的学生。有幸的是当时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容观复、刘孝瑜、刘耀荃、吴玉章、杨扑羽、张雄、谭庆等老师教学有方,使我不仅获得了知识,也逐渐懂得了做学问的方法,更是树立了从事民族研究的学术方向。从此之后,中间虽经历了种种酸甜苦辣麻,在学术道路上曲曲折折、折折曲曲,但我始终坚守“锲而不舍”的信条,终于走过“沼泽地”,成就了对中国汉民族研究的学术建构。

在我研究汉民族的历程中,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首先是对汉民族本身的认识,经历了从历史切入,进入族群结构的分析,再进入风俗文化与风俗史的建构,分别以《汉民族发展史》《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和《汉族风俗史》为标志。其后,在汉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团结研究交融的时候,顿悟到对汉民族的研究不能仅站在汉民族的层面上去研究汉民族,而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去研究汉民族,在这个高度上去看汉民族,汉民族只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对汉民族的这个认识我写入了《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一书中。

早在10年前的金秋十月,我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庄英章先生之邀访学时,每晚在庄先生的办公室,挑灯撰写《汉族风俗史》自序,曾对我研究汉民族的历程作过一次回顾,今转引如下:

新世纪之初的金秋时节,随着《汉族风俗史》的杀青,我们为之奋斗了20余年的汉民族研究的学术体系终于形成了。回忆着20余年来自己孜孜不倦的执着学术追求,心潮逐浪高……

(一)播种

1985年4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用5号正楷排出一篇“豆腐块”,题目叫做《汉民族研究刍议》。这就是我第一次在媒体呼吁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全文见本文集第17页。

文章虽短,但却很快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中央民族大学著名民族史学者陈连开教授后来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碰见我,谈起我的这一篇文章时说:“当时看到刊登的《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心想,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这个徐杰舜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我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说来话长。1961年我从武汉大学附中毕业后，参加高考，阴差阳错地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当时我年仅17岁，年纪虽轻，经历虽单纯，却充满了追求理想的热情。进入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学习时，我一下子被历史吸引住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一上课就碰上了岑家梧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原始社会史。岑教授是当时我国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专家，其在日本求学时就以《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三本著作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学术地位，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有“南岑北费”之说，即中国南方的人类学民族学以岑家梧为学术带头人，北方以费孝通为学术带头人。岑教授深入浅出，把我在中学里认为最枯燥无味的原始社会讲得生动且引人入胜，使我一下子就确立了终生献身于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的理想。

正是在岑教授的鼓励 and 指导下，刚学完原始社会史的我就与已在大二就读的同窗彭英明（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一起，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积极投身到1961年起已在学术界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关于民族译名问题的学术讨论中去了。当时牙含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出关于民族的形成问题，即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是“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在这里牙先生只有论点，没有论证从部落到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于是我们“现买现卖”，很认真地阅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撰写发表了我们的处女作：《试论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历史过程》。就是在这篇处女作中，我们在试论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提出了汉民族也是从部落发展而形成的观点，从而种下了进行汉民族研究的种子。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武义县第一中学当起了中学教师，一干就是20年。理想如同植物的种子一样，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总会萌芽！正如一首名为《播种》的小诗所言：开始了/当我降落沃土/仿若看见/新旅程/远方的梦/伴随一声春雷。

（二）萌芽

平地一声惊雷，1976年10月乾坤扭转。严冬过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温暖的春天，汉民族研究的种子在春风的吹拂下终于破土而出，萌芽了！我开始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我觉得汉民族形成历史过程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前沿性的课题，于是汉民族研究的种子就从这里开始萌芽，正如一首名为《萌芽》的小诗所言：我触碰/天的蓝/风的轻柔/朝阳的温暖/于是急切伸展。

(三) 抽枝

万事开头难。汉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为学术界的一个前沿性课题,要去完成,谈何容易?! 开始是没有时间,现在想起来真是艰难,白天我要劳动,武义一中的农场不仅有一个200多亩的茶山,还有几十亩稻田,我一个人既要种稻,又要育茶,还要安排和带领学生劳动,而且学校农场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每天奔来跑去,辛苦不用说,就是最宝贵的时间大大不够。致使我每天晚上都要挑灯夜战。记得1979年的冬天特别阴冷,且多雪,我常常用毯子把下身包起来,每天写到凌晨时分。在开笔撰写《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时,我又到武义县桐琴果园去劳动。在果园,我白天与农工一起劳动,下午收工后用井水洗了澡,吃了饭后就“躲进小楼成一统”(好在果园领导关心我,给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奋笔疾书,几乎每天都写到凌晨二三点才睡觉。当时刚上小学的儿子徐武放寒假跟我在一起,每天晚上睡醒时总看见我坐在书桌旁的背影,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他读初中写作文时,就写过一篇《父亲的背影》的作文,极富感情,获得语文老师的好评。语文老师还特地向我推荐了这一篇作文,读后,我心中暖洋洋的,能得到儿子的理解和认同,我感到无比地欣慰!这样挤时间、抢时间,经过两个多月的挑灯夜战,1980年春节前,5万余字的《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杀青,当时虽是深夜,正是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之时,但我为在汉民族研究的北大荒里开垦出了一块土地而感到暖烘烘的,正如一首名为《抽枝》的小诗所言:终于/稳稳站在芬芳的土地/太多未来等待开始/将有艰难必须面对/成长是一种使命。

(四) 扎根

从萌芽到抽枝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从抽枝到扎根是一个更艰难的过程。

《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的初稿杀青后,1980年春节我乘回武汉探望年迈的父亲之时,把书稿给母校的老师刘孝瑜教授审阅。没想到刘教授给书稿以高度的评价,认为我的稿子一是创造性地运用恩格斯“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理论观点,二是又发展了范文澜先生关于汉民族是一个特殊民族的观点,三是提出了汉民族形成是夏商周三代的新观点,是民族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建议我交出版社审定出版。

为此我向早在我读大学期间曾鼓励我和彭英明研究民族形成问题的牙含章先生求教,牙先生建议我把书稿寄给四川民族出版社的编辑李峰铭先生审阅,于是开始有了把《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这支小树培育成《汉民族发展

史》这棵大树的过程。

1980年夏,我将《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一稿寄给了四川民族出版社的李峰铭先生。不久,我收到李先生的来信,李先生明确告诉我选题很好,有学术价值,建议我补充一些内容,写成六七万字的书,并将书名改为《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这封信对于身处逆境中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付兴奋剂。白天劳动虽然辛苦,尤其是果园里的梨子成熟时,晚上我还要值班巡逻。由于蚊子又多又大,大热天还要穿上雨衣雨裤和高帮雨靴防蚊,但我仍然坚持边工作边修改,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按李先生的要求对书稿作了修改,并补充了汉民族的特征一节,于1981年春将《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寄给了李先生。这一次书稿寄出后,出人意料,除收到李先生一封书稿已收到的来信以外,久久不闻音讯。从果园到县城有30多千米,我每周回家过礼拜时,问我夫人的第一句话就是四川有信来吗?这样,在企盼中,我苦苦地等了一年半,那时我常常想,我的《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这支小小的嫩枝能成活吗?当时我还没奢望它成为一棵大树。

1982年6月,我终于收到了李先生的来信和退回的稿件。当收到这个邮件时,我心中一沉,是不是退稿了?但打开一看,既喜且忧,喜的是并没有退稿,而是我的书稿经过审阅,并征求了牙含章先生的意见,出版社决定出版;忧的是李先生经过审阅,对书稿提出了70多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写成了小纸条,夹在稿子的相关地方,要回答和解决这70多个问题对我来说既是一个新的难题,又将是一个新的高峰,我能攀登上去吗?过去是没有时间,现在则是缺乏资料。在当时来说,我所处的武义及其周边的图书馆凡能借到的书我都借来看了。怎么办?到哪里找资料呢?想来想去,只有去上海图书馆。当时虽然因胡耀邦总书记签发了落实有关政策的文件,我正从果园回到家中等待分配工作,但每月只有35元生活费的我,要到上海去谈何容易?这时我的患难伴侣、夫人徐桂兰想出了一个办法。她说:你们家不是有亲戚在上海吗?你坐来我们仓库运蛋的上海车去,不是可以不用花钱了吗!当时徐桂兰在武义县食品公司蛋库工作,每年蛋季都有上海食品公司的汽车来运蛋。于是我决定坐运鸡蛋的汽车到上海图书馆去看书。

从武义到上海,有800多千米路,头天下午我从武义出发,在义乌县过夜,第二天下午5时左右到达上海。坐蛋车当然没法与现在流行的豪华空调大巴车比,但当时我为能不花钱到上海去看书查资料心中美滋滋的,高兴极了!上海的亲戚是父亲的表弟,住在老西门。他们家虽然十分狭窄,人口又多,但还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安排我住在他们家中,晚上打地铺,住宿条件当然也

没法与现在老百姓普遍住的新装修的房子相比,但在上海有一个安身之地,且又不花钱,早、晚还管饭,那是我父亲的面子,也是黄北康表叔对我的关心。

就这样,我每天早上在北康叔家中吃泡饭,然后走路到地处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去看书,中午在馆里买两个面包当午饭,晚上再回到北康叔家中就餐。我第一天进上海图书馆时就碰到了进门难的问题,因为我既无介绍信,又无工作证,却想看当时一般人看不到的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书籍,尤其是港台出版的书籍,怎么办?连门都进不了,还谈什么看书查资料?难道这一趟要白跑了吗?还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很理解一个做学问的人的心理的。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问我带有什么证明材料,我想到了我仅带了四川民族出版社李峰铭的来信,这位工作人员就叫我找馆领导去解决问题。经他的指点,我找到了馆长办公室,一位主管的副馆长听了我的叙说,看了李峰铭的来信,就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进馆查阅,由于签名十分潦草,我当时又不敢问,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他姓啥名啥,但我永远都不能忘却。正是从那时起,我这颗被提起来了的心才落下来,开始了继续培育《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这棵大树的最关键的一段历程。

就这样,我早出晚归,如饥似渴地看了一本又一本,有重要的材料没有钱复印就抄书,做卡片。买不起卡片,我就从文具店买来一般16开的白纸裁成64开做卡片。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大约查阅了100多本专著,做了3000多张卡片,不仅李先生提出的70多个问题我基本上可以回答了,而且由于看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分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之类的书籍,我对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尤其是汉民族的特征有了新的认识。吸饱了养分后,我回到武义家中,开始对书稿进行全面的修改。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季树才先生。当时他任武义县宣传部负责人,主管教育,具体管我的工作分配问题。在分配前,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向他说了我正在按出版社的要求修改《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希望他能给我点时间。他果然爽快,同意我在家修改书稿,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告诉他,什么时候分配我工作。这样,我得到了难得的时间,事隔将近20年了,我至今还是要感谢他!

这次修改,一方面有了较充足的时间,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充足的养分,所以我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修改工作,将7万字的《汉民族形成与发展》扩大成了20万字的《汉民族史》。当我用方格稿纸将草稿抄正之时,看着厚厚的约有700页的书稿,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悲壮之情,逆境中的崛起真是既悲且壮啊!正如一首名为《扎根》的小诗所言:茁壮并深根/我们平和地迎接/雨的狂/风的劲。

(五)见树

深深扎根于土地上的小树是不怕风雨的,具有生命力的,20余万字的《汉民族史》又经历了一个从小树长成大树的路程。

1983年初《汉民族史》交稿后,我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为了能实现在大学求学师从岑家梧教授时曾立下终身从事民族研究的理想,从1983年到1984年底不断地向在报上刊发了招聘启事的单位联系调动之事。1984年底,我接到我的师兄张有隽的来信,他说从中南民族学院方面得知我仍在中学教书,见我这几年发表了几篇论文,知道我一直坚持民族研究工作,说他现在已任所长,问我是否愿意去广西民族学院工作。接到信后,我与桂兰商量,广西虽然偏远,但搞民族研究的资源丰富,1964年到1965年我参加三江“四清”工作,到过柳州、桂林,对山清水秀的广西有良好的印象。南宁虽然没有去过,但我想南宁作为广西的首府不会比桂林、柳州差,加上民族学院内有一个相思湖,学院的自然环境也一定很好。这样,从来没有到过广西的桂兰,在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坚决地同意与我一起去广西民族学院。

决心已定,我和桂兰都同时向单位递交了请调报告,花三天时间打点了全部行李,用火车托运了行李,于1985年3月25日一家三口乘火车离开工作了20年的武义,奔赴陌生的南宁!

到广西民族学院没有多久,不仅《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写的《汉民族研究刍议》,也收到了四川民族出版社李峰铭先生的来信(这时李先生已担任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副社长),要我到成都面谈书稿出版的有关事宜。于是,经学院黄鸣院长的批准,1985年,我利用到北京参加全国民族理论工作会议的机会,乘飞机绕道到成都,见到了李峰铭,并陪同李先生一起到重庆,住在重庆海军招待所里,两人长谈了两夜。李先生对书稿的意见是:现在20万字的书稿比第二稿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社里对这本书寄予很高的希望,希望我能利用在广西民族学院工作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扩大资料面,吸收近几年相关的学术成果,写出一流水准的《汉民族史》,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能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我对李先生提出的要求感到惶恐,我对李先生说:我写第三稿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我的水平,要写出全国一流的学术专著,恐怕很难胜任。李先生却不以为然,举了学术界许多实例,说明了学问是人做出来的,学术界许多大学者都是从小做起的,关键是你研究的方向准不准,学术是不是真正的前沿,如果认准了,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三稿比二稿更好,难道你不相信四稿